

国图藏《清芬外集》所收乾嘉学人 致刘台拱书信考论

黄 湛

内容摘要: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刘宝楠辑抄本《清芬外集》中,有乾嘉时期重要学者如姚鼐、任大椿、李惇、翁方纲、卢文弨等人致刘台拱函,未收入诸家文集,亦不见于刘氏遗书。其内容除告知近况和寒暄之辞外,还涉及古籍校勘和经典研究的具体问题。文章对诸函写作时间及内容进行考证,并考察了刘氏与诸人交往论学之始末。在此基础上,结合清中期考证学思潮及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,可分析相关学人的治学理念。

关键词:刘台拱 姚鼐 任大椿 李惇 翁方纲 卢文弨

刘台拱(1751—1805),字端临,扬州宝应人,清中期著名经学家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)举人。刘氏早年致力于程朱理学,后转向经学考据。著有《论语骈枝》《经传小记》《荀子补注》《方言补校》《汉学拾遗》等,身后由亲友整理为《刘端临先生遗书》,凡八卷。乾嘉时期名家辈出,刘台拱虽闻名当时,却不为后世学人关注 and 熟悉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是刘氏著作及书信、文章传世较少,对其学术思想和生平交游,难以详加考证分析^①。中国国家图书

①研究刘台拱学术思想及生平交游的文献材料主要有三类:一为刘氏著述,即八卷本《刘端临先生遗书》;二为刘文兴编《刘端临先生年谱》(郑晓霞、吴平编:《扬州学派年谱合刊》,广陵书局,2008年),除对刘氏生平经历做详细梳理外,亦收集不少刘氏与时人的通信(此外,罗振玉《昭代经师手简》辑有两封王念孙致刘氏书札,收入广陵书社编《宝应刘氏集》);三为时人文集中相关书信及有关刘氏的文章,例如段玉裁《经韵楼集》即收录三十一封致刘氏书信。此外,美国学者本杰明·艾尔曼(Benjamin A. Elman)指出,刘台拱曾与204位学者通信,“生前虽然未出过学术专著,但和204位著名学者(如阮元、臧庸、段玉裁)经常通信,交换对经学研究看法,对当时的许多知名学者产生了影响。”(艾尔曼著,赵刚译:《从理学到朴学——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140页)然而据笔者所见,该书英文原著并未提及“204位学 (转下页)

馆藏清刘宝楠(1791-1855)辑抄本《清芬外集》(索书号 05697)卷七有姚鼐(1731-1815)、任大椿(1738-1789)、李惇(1734-1784)、翁方纲(1733-1818)、卢文弨(1717-1795)等人致刘氏书,未为各家文集所收,世所罕知。这些书信涉及论学、生活、著述刊刻等内容,考论其文,对于了解刘氏及相关学人的治学和交游情况,弥足珍贵。

一、李惇函

曩者与容甫言:“足下与怀祖学行不愧古人,交情或未十分浓至。”今而知说之非矣。惇因衰病侵寻,进取之念既灰,著述之心亦懒,惟朋友之爱不能忘怀。如足下及易田、怀祖、容甫诸公,惇一得侍,便神志飞舞,终日不语,而性情亦适。

按:李惇,字成裕,扬州高邮人。乾隆四十五年(1780)进士,卒于乾隆四十九年八月。李惇在中进士后,江苏学政谢墉聘其为暨阳书院院长,后因谗言遭罢免,故李函中有“进取之念既灰”之语。其后李氏居家,得病而终^①。观李氏此函自述病态,当为其晚年衰病已笃时所言,故此函盖作于李氏病逝前数年间。

函中提及程瑶田、王念孙(字怀祖)、汪中,与李惇、刘台拱同为当时江南经学研究的重要人物^②。李、刘二人的交往关系,可凭借两通汪中的信作为辅证,以对李氏此函有进一步的了解。乾隆四十一年,汪中致信刘台拱云:“中在府城时,尚与成裕聚处四五日,其心折于足下者甚至。至于学术同异,则诚不可以口舌争也。然所谓他日之合者,或足下可合于成裕与中。而成

(接上页)者”。原文为:“Similarly, Liu Tai-kung, although he published no work during his life time, exchanged letters on classical research with such noted Han-Learning scholars as Juan Yuan, Tsang Yung, and Tuan Yü-tsai. In this way, Liu influenced many leading scholars of his time.” Benjamin A. Elman, *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: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*,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4, p. 204. 原著此句在第 204 页页首,该页顶部印有页码及本节标题:“204, Scholarly Communication”。疑译者误将页码 204 及标题部分与原文混淆,一并翻译,以致中译本误作“204 位学者”。

①江藩:《汉学师承记》卷七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10-111页。

②阮元言李惇“与同里贾君稻孙、王君怀祖同力于学。兴化顾君文子、任君子田、宝应刘君端临、江都汪君容甫、歙程君易田,皆学术擘摩,极一时之盛。”阮元:《擘经室集·续集》卷二《高邮孝臣李君传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9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道光阮氏文选楼刻本,1995年,第470页。

裕与中,则不能合于足下也决矣。”^①乾隆四十四年,汪中又作书曰:“李君相见时,每以足下笃信宋人为恨。君子之学如蛻然,幡然迁之。未审比来进德修业,亦尝发寤于心否?”^②刘台拱虽精于礼学、从事经学考据,但他在思想上一直尊奉程朱理学,从未改变。李惇虽“心折”于刘台拱的人格和学养,却对刘氏笃信宋儒的学术倾向不敢苟同。汪中所说的“学术同异”,是指他和李惇专事经术,与仍然崇尚德性之学的刘台拱判然殊途。三人论学中体现的矛盾和张力,可看作当时汉宋之争大环境的缩影。学术思想上的分歧却并未影响到刘台拱与汪、李间的友情。从李函所言“惇一得侍,便神志飞舞,终日不语,而性情亦适”,足见李惇对包括刘氏在内诸位学友的敬仰和珍惜之情。

关于刘台拱的治学转变,其表弟朱彬回忆道:“彬幼年与端临从事于此(笔者案:指程朱理学),自审未能窥其樊。端临尔时,已择之精而守之固。后各从事经学,此事遂废。”^③刘氏转而专注于经学、小学,虽然不像汪、李二人那样抨击宋学,但不再关注涵养德性工夫,其经学论著也很少涉及道德性命的精微义理。如上文所述,这一学术转变缘起于居乡时期,由宋学起脚的刘台拱,因汪、李的劝说而有所动摇。但真正引导他进入汉学领域,并受到当时主流学界瞩目,与刘氏身处京城期间的学术经历关联密切。

刘师培认为,刘台拱的学术转变应完全归功于王念孙:“刘台拱治宋学,上探朱、王之传,中兼治词章,杂治史籍。及从念孙游,始专意说经。”^④然此说实无确切文献资料可据。结合前文论任大椿函时谈及刘氏居京期间的学术交往情况,他的学术转变当系乎京城整体学术氛围的影响,并非因王念孙一人之力促成。

李惇在函中又提到,他原以为刘台拱与王念孙交情不深,今知此说之诞。其实刘、王两人早在乾隆三十七年(1772)刘台拱赴京应试期间即已相识,并结为至交好友^⑤。此年刘氏未能高中,落榜后留在彭元琬馆中教授生徒,并开始

①刘文兴编:《刘端临先生年谱》,第207页。

②刘文兴编:《刘端临先生年谱》,第208页。

③朱彬:《游道堂集》卷二《与叶子云书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437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绪二年(1876)宝应朱氏刻本,2009年,第607页。

④刘师培:《左盦外集》卷九《近儒学术统系论》,《刘申叔遗书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民国二十三年(1934)宁武南氏校印本,1997年,第1533页。

⑤王念孙《刘氏遗书序》:“岁在壬辰,予以人都应礼部试,始得交于端临。”壬辰即乾隆三十七年(1772)。王念孙:《刘氏遗书序》,刘台拱,刘宝楠等:《宝应刘氏集》,广陵书局,2006年,第36页。

专注汉学考据。王念孙同样遭受科举失利的打击,将精力置于学术研究之中。两位失意举子往来论学,互相倾慕,“每得一义,必以相示”^①。后来刘台拱在丹徒任官时,两人相隔千里,联络却仍旧密切,“邮书来往,以所得相示,如在都下时”^②。王念孙在刘台拱过世后,为其遗书撰写序文时,推许刘氏治学“唯是之求,精思所到,如与古作者晤言一室,而知其意指所在。比之征君阎百诗、先师戴庶常、亡友程易畴,学识盖相伯仲”^③。其中,王念孙甚至将刘氏与自己的老师戴震相提并论。王氏又谓:“予与端临交三十余年,故知之独深。辄表其学识之精以告后之学者,使皆知端临读书之法,而用之读古人之书,则古人之幸也。”^④王念孙推举刘氏学术之意,足以显现知己相倾之谊。

二、任大椿函

令弟九兄回里,与先生侍养官斋,天伦之乐,纯全粹美,真足健羨。研经妙旨,悉臻无上。暇时能见示一二,其所益于铨材者,非浅也。弟又新刻殷敬顺《列子释文》上下二卷,与今本《列子》张湛注相较,乃知湛注大半是《释文》。弟又作《释文考异》二卷,附《释文》后。刊成寄上呈教。

按:任大椿,字幼植,扬州兴化人。乾隆三十四年(1769)进士。任氏卒于乾隆五十四(1789)年,《列子释文考异》于乾隆五十二年方成书。信中有“弟又作《释文考异》二卷”诸语,故该函当作于乾隆五十二至五十四年间。文中“令弟九兄”是指刘台斗,乃台拱异母弟。乾隆五十一年,刘台斗中举后归里侍亲,故任氏函中有艳羨天伦之语。

刘台拱与任大椿的往来论学情况史载不详。两人大概相熟于《四库全书》编纂期间。刘氏于乾隆三十七至四十六年多次赴京赶考,其中四十三至四十六年供职于翰林彭元琬府^⑤。此间,他与京师名流特别是四库馆臣多有接触,包括时任四库馆协勘总目官的任大椿。据朱彬所记,刘氏与朱筠、戴震、任大椿、王念孙等名儒往来频繁,诸君“相约稽经考古,旦夕讲论,务求底于至是而后即安”^⑥。刘氏在其中年纪最轻,却能够“每发一义”,使“诸老先生莫不

①王念孙:《刘氏遗书序》,《宝应刘氏集》,第36页。

②王念孙:《刘氏遗书序》,《宝应刘氏集》,第36-37页。

③王念孙:《刘氏遗书序》,《宝应刘氏集》,第36页。

④王念孙:《刘氏遗书序》,《宝应刘氏集》,第37页。

⑤彭元琬任职翰林院检讨、武英殿提调官。其兄彭元瑞是刘氏参加乡试时的考官,其后更担任四库馆副总裁的要职。刘氏在京师时馆于彭元琬府,通过这一途径,有机会接触《四库全书》编纂事宜,结识众多四库馆臣。刘文兴编:《刘端临先生年谱》,第202页。

⑥朱彬:《刘端临先生行状》,《宝应刘氏集》,第38页。

折服”^①。刘氏覃精经学、深于考据的声名也就由此在京城传播开来。

该函涉及的《列子释文》刊刻事,可与任氏《列子释文考异序》一文参看^②。《序》中提及今本《列子》目录之前“并标张湛注及敬顺释文”,每卷篇首则“独标湛注”。换言之,原书中殷敬顺的《释文》内容与张湛注混在一起,难加分辨。因此,任氏所作的文献工作是“以道藏本证之,则注自为注,释文自为释文”。《序》中所言“道藏本”,即指函中“新刻殷敬顺《列子释文》上下二卷”。此书是他在乾隆四十三年(1778)途径河南桐柏县淮渚庙时,从“道藏残帙数架”中检得的古籍。其书“体例仿陆氏《经典释文》。凡所征引,多为前代逸书。又于正文之下,附载异文,率皆当时流传旧本”。任大椿指出,道藏本《列子释文》引用了不少唐前逸书;其中征引的古籍异文,可与传世诸书对勘,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

至于“今本《列子》”,任大椿的评价是:不仅殷敬顺《释文》“阙佚甚多”,还将张湛注“加音释”的部分全部删除;传世本《列子》张湛注大半都是殷敬顺《释文》的内容,其中的注文混乱,相去道藏本甚远。有鉴于此,任氏仿照道藏本的体例,重刊新本《列子释文》,又于其后附作《考异》,希望自己偶然发现的善本能够广为流传,嘉惠学林。

三、翁方纲函

山川间阻,久未致书。迺惟年兄道力加笃,著述日新,以企以祝。去岁在江西所拔士,有新城两鲁生,年少而精研三礼。于北上时,属其面谒中途,未遂其愿,当谋后会,有以集益耳。兹青阳徐伯斋南来,谋欲奉访。此人虽不及两鲁生,而于三礼之学亦极用心。今日为《礼经》之学者,必以年兄为准式。是用谆语后学,进而请教,谅亦同志所乐从也。顺问不具。

按:翁方纲,号覃溪,直隶大兴人。乾隆十七年(1752)进士。函中所说“新城两鲁生”,为鲁肇光、鲁嗣光兄弟^③。二人为江西著名文士鲁九皋之子,

①刘文兴编:《刘端临先生年谱》,第208页。

②任大椿:《列子释文考异序》,杨伯峻:《列子集释·附录二〈重要序论汇录〉》,中华书局,1979年,第283页。

③翁方纲有诗《发南昌述怀十六首》,其一有云:“辛邓既北上,二鲁亦予依。”《饶霁南侍讲春雨课耕图》诗亦云:“我在盱江歌贡玉,二鲁材并王吴俦。”两处均于“二鲁”下自注:“肇光、嗣光”。翁方纲:《复初斋诗集》卷三八、四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李彦章校刻本,1995年,第26、52页。

从游翁氏左右,名字频见于翁氏诗文集。此函具体年份可从“去岁在江西所拔士”考得:乾隆五十一年(1786)至五十四年,翁氏任江西学政。期间,乾隆五十一年、五十三年两次乡试,五十四年则为十二年一次的拔贡考试。鲁肇光既身为拔贡,可知此函当作于乾隆五十四年。

刘台拱在京期间,从游于翁方纲门下^①。翁氏虽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的编撰工作,从事文字考订,却反对背离程朱义理、嗜好异说的治学风气^②。他对当时考据学、汉学多有批评,如他撰写的长篇文章《考订论》,即旨在说明“考订之学,以衷于义理为主”^③。从翁函可以看出,他十分推许刘台拱的礼学。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刘氏身处京城时,翁方纲便对其礼学予以肯定和鼓励。他曾说:“今之精研三礼者,吾最许宝应刘端(林)[临]。”^④翁氏本人于礼学用力颇勤,有《礼经目次》《礼记附记》等专著,传世文集中的论礼文字亦极丰富。他不满当时以考据为主的治礼风气,尤其排斥礼学家花费过多精力,用于考订典章名物和上古礼制,认为对经世并无裨益。在翁方纲看来,古礼时代遥远,内容复杂,多不合时宜。他提出古礼考证只能局限在历史研究层面,反对通过“纂礼”或“考定”谋求复古,通过古礼改变现世的社会制度和礼仪规范^⑤。且就考据而言,仅凭传世文献,许多礼制尚不足定讞。因此礼家当慎下论断,不应妄作新说。

翁氏的礼学观念同样反映在他对刘台拱的教导中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)九月,刘台拱离京南下,翁方纲送别作序曰:“宝应刘生学广而气醇,吾尝谓今世后进之士考订《礼经》者,必于生属焉。故于其归而发之曰:吾所谓订《礼经》者,非谓礼有所未安,有待于厘次之也。”又说:“吾所属望于生

①翁方纲《考订论中之二》云:“吾门从游者,则若宝应刘台拱、海州凌廷堪、曲阜孔广森、南城王聘珍。”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七《考订论中之二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5册,第415页。

②翁方纲在《诗考异字笺馀序》中指出,当时“专为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之学者”,“多喜创获,好为立异”。他还批评惠栋《易述》“毅然改经字,以就其所据一家之说,以新奇为复古。”翁方纲认为,惠栋擅改经文以求新解的做法,名为“穷经”,实则“反害于经”。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一《诗考异字笺馀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5册,第359页。

③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七《考订论上之一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5册,第412页。

④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十二《送顾文子进士归兴化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5册,第465页。此文作于乾隆四十六年(1781),文中有“今辛丑正科”,指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举会试。

⑤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七《考订论下之三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5册,第417-418页。

者,则欲考其篇目章句而已。”^①翁氏在文中先说后生才俊中,以刘台拱的资质最堪“考订《礼经》”的大任。继而论述所谓“考订《礼经》”,标准只在“考其篇目章句”,也就是整理文献,而非议论礼制。尽管翁氏在经学方面主张考订以义理为依归,却在礼学研究上倾向考订章句。至于议论礼制或者阐发礼意方面,却甚少措意。

同年十一月,翁方纲作《次韵答韦静山孝廉》一诗,自注中再次提及刘台拱的礼学研究,他说:“篇目之学最难,宝应刘端(林)[临]意见颇正,而搜采未全。今端(林)[临]已南归,于其行也,淳切相勗,未知何日成之。”^②盖刘台拱当时正致力整理《仪礼》篇目,故翁氏有此说。翁氏文集所收与刘氏相关的书信序跋,多为刘氏离京前后,约乾隆四十六年(1781)的作品。《清芬外集》此函则为此后数年身处异地的两人保持联络之证明。

刘台拱早年曾校勘《仪礼注》,精于三礼学^③。南下后钻研经学,于《仪礼》考订用力尤多,且在当时学坛颇负声望。故翁方纲函中称:“今日为《礼经》之学者,必以年兄为准式。”刘氏曾耗费大量精力撰写《仪礼补疏》,惜乎文稿毁于火灾,最终未能面世^④。仅有五十条遗文存世,编入《经传小记》,致使后人不能尽窥刘氏的礼学造诣。加之刘氏传世著作不多,相较于同时学友而言,略显声光暗淡。

四、姚鼐函

奉别累年,日有企想。春间得赐书,欣慰无量。浅学陋识,乃承褒许过当,愧悚愧悚。所论为学之病,及古今转移事理,论伟且确矣。第以鼐承障川回澜之责,非所任也。从来学者自负所有,以视他人,谓吾之异于彼也。然而人之视我也亦然。交友学徒居相近习者,各为其党,

①翁方纲: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十二《送刘端林归宝应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5册,第464页。

②翁方纲:《复初斋诗集》卷二九《次韵答韦静山孝廉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4册,第624页。

③汪中于乾隆三十八(1773)及四十一年(1776)写给刘台拱的信中,先后提及:“《仪礼》校本尚存尊处,宁可久假,勿为人所浮沈”,“《仪礼注》校出者,望明以告我。”刘文兴编:《刘端临先生年谱》,第206页。

④相关记载见臧庸:《书刘端临先生遗书目录后》,《宝应刘氏集》,第35页。关于此书的名称,各处记载略有出入,其中以《仪礼补疏》最为多见(王念孙信、段玉裁信、臧庸《书刘端临先生遗书目录后》),其名或作《仪礼义疏》(段玉裁《刘端临先生家传》)、《仪礼传注》(《清史稿》)。

其同异相轧也,亦若是已矣。夫恶知其孰贤?事非死后要不能定。若同时有相忌求名之心,既鄙甚矣,究何裨哉? 鼐材庸下,本无所有,又以示常自惩戒,不敢与天下学士较长短。先生之教,敬佩于衷而已,所命非所任也。前年江西陈用光以所抄鼐《古文》、《春秋说》、《三传补注》刻板,板尚在其家。《古文》送来数十本,为人取尽,更往求得,乃当奉寄。谨以《春秋说》及《补注》寄呈教。其所刻不全,雕手又极劣,要须他日另刻耳。今秋录遗时当可对谈,兹略报不具。

又

两年来违隔教言,极怀企想。鼐自揣薄劣,而年衰气短,不能更与海内贤偶更竞千古之事。姑就生平所已就者,订之为书。遂付雕板,谨以两种寄呈大教。先生当知愚鄙之见,非以斯为已足,但力有不能更进耳。鼐秋来病,瘳下数日,今甫愈。此间苦渺可与谈之人。京江近得士未? 顾生复作何状? 甚思念也。想此时正当学使按临,必以公事烦劳,过是亦可得闲静矣。舍外甥马鲁成方署合肥教谕,顷当亦谢事矣。秋凉,惟保重千万,馀不备及。

按:姚鼐,字姬传,安徽桐城人。乾隆二十八年(1763)进士。《清芬外集》两通姚鼐致书,第一函论及学术及姚氏《古文辞类纂》等书刊刻事;第二函自述已况,并询问刘氏近景。

关于撰写时间,第一函盖作于乾隆六十年(1795)春秋之间,本年姚鼐主讲于江宁府钟山书院。他信中所提及的“《古文》《春秋说》《三传补注》”三书,分别为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九经说》中的《春秋》部分、以及《三传国语补注》中的《春秋三传》部分。其中,《古文辞类纂》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(1779)七月,是姚氏有关文章理论最重要的作品。《三传国语补注》和《九经说》则是姚氏晚年投入极大心力的经学著作。《三传补注》成于乾隆五十七年(1792),由门人陈用光(1768-1835)刻成。《春秋说》亦刻于此时^①。信中又说陈用光于“前年”刻书,依此推算,该函所作时间应系于乾隆五十九年(1794)。

然而,姚氏第二函中提及:“姑就生平所已就者,订之为书。遂付雕板,谨以两种寄呈大教。”所寄两书,即第一函提到的《春秋说》和《三传补注》。两函所说寄上两书实为同一事。也就是说,第二函作于第一函后不久,二函当系同年。姚鼐在信中提到外甥马宗珪(号鲁成,1757-1802)得官一事,这是姚氏两函系年的重要线索。按马氏原本在京师参与编纂《经籍纂诂》,后

①姚鼐:《与秦小岍书》、《与陈硕士尺牍》,孟醒仁:《桐城派三祖年谱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,2003年,第202页。

以大挑二等,得官合肥休宁教谕^①。而举人大挑授官之期,在乾隆嘉庆之际,分别为乾隆五十二年(1787)、六十年(1795)和嘉庆六年(1801)三次^②。则马氏以大挑得教谕之职,姚氏两函撰作的时间,均当在乾隆六十年。第一函首又提及“春间得赐书”,结尾言“今秋录遗时当可对话”,则姚氏撰写此信的确切时间是乾隆六十年春秋之间。第二函则作于乾隆六十年秋季。

姚氏在第一函中提到:“《春秋说》及《补注》寄呈教。其所刻不全,雕手又极劣。”即姚氏门人陈用光两年前主持姚氏文集刻板一事。刻板竣工当年,即乾隆五十七年(1792),姚鼐致友人秦瀛信中,亦有“江西一门徒取鼐文刻板,鼐意乃不欲其传播,属勿更印,故今绝无此本子”语^③。“江西一门徒”即指陈用光。姚鼐在信中透露,自己对刻板质量不甚满意,无意广为流传,仅寄给友人作小范围交流用,之后当托人另行刊刻。嘉庆元年(1796),姚氏著作经由门人朱则泊、朱则澍再行刊刻,嘉庆二年(1797)完成《九经说》十二卷,其中包括《春秋说》。同年,“江宁诸生”又刻《三传国语补注》。此正合函中姚氏所说“要须他日另刻耳”。

姚鼐于第一函中提及,刘氏来函“论为学之病,及古今转移事理”,姚氏表示深孚其说,谓刘氏所论“伟且确矣”。其中“为学之病”所指,当是姚氏最为反感的门户偏见问题。他在函中指责当时学者说:“交友学徒居相近习者,各为其党,其同异相轧也。”姚鼐之所以有如此态度,与他早年任职四库馆时的经历密切相关。姚氏供职四库馆时,馆中诸人“竞尚新奇,厌薄宋元以来儒者,以为空疏,掎击讪笑之,不遗余力。”^④姚鼐与馆中诸人往复辩论,终感学术孤立,乞病离馆。汉学家轻视理学、批判宋儒,在当时蔚然成风,传统宋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。姚鼐不趋附潮流,但他亦非盲目尊宋学者。姚氏所深恶痛绝的不在经学考据本身,而是汉宋之争背后体现的门户之见,以及据此攻彼的狭隘学术观念。

①有关马宗琰生平的讨论,参见李洛旻:《马宗琰〈春秋左传补注〉研究》,岭南大学2011年哲学硕士论文,第4-16页。

②《桐城耆旧传》、《清史稿》等史籍未记马氏得官具体年份。依大挑时间推算,马氏得官当在乾隆六十年(1795)。有关清代大挑选官的讨论,参见张振国:《清代举人大挑的次数与频率》,《史学月刊》2012年第10期,第130-132页。

③姚鼐: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六《复秦小岍书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庆三年(1798)刻增修本,1995年,第53页。

④姚莹:《东溟文集》卷六《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512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同治六年(1867)姚浚昌安福县署刻中复堂全集刻本,1995年,第429页。

相较之下,刘台拱治学以通达为世所称,如王念孙说他“于汉、宋诸儒之说,不专一家”^①。朱彬称其“于汉宋诸儒,绝无依傍门户之见”^②。虽然姚鼐与刘台拱只有几面之缘,但相同的治学观念让两人十分投契,通过书信袒露心扉也是情理中事。

据笔者所见,除国图《清芬外集》所收两函外,传世文献中关于姚鼐与刘台拱的交往记录,仅见于乾隆六十年(1795)秋,亦即姚氏二函的同一年。姚氏在秋日所作第二函中,尚感慨与刘氏久未谋面,就在其后不久,刘台拱便造访江宁,与姚鼐会面^③。刘氏此行,主要是为录遗之事,即姚函所说的“今秋录遗时当可对谈”。所谓“录遗”,是指在各地院试中未能考中一、二等的秀才,本没有进一步参加乡试的资格,通过“录遗”补考,这些“遗才”可以取得额外的机会^④。

刘氏时为丹徒县训导,负责丹徒县学的教育和考试选拔之事^⑤。此次会晤,两人相谈甚欢,姚鼐事后致信刘氏说:“在省接待匆匆,以不获多领教益为恨……安得如先生数人,无事共晨夕乎。”^⑥刘台拱又出示晚明大儒刘宗周为刘台拱六世祖刘永澄所作的悼文《淮南赋》。姚鼐观之,“感怀凄怆,不能自己”^⑦,遂为此赋撰写跋文。若说刘台拱研究经学,从事考据,深受时代氛围的感染,那么其精深于宋学,主要是受家学渊源的影响。刘永澄是万历二十九年(1601)进士,历任顺天府学教授、国子监学正等职。他与东林党人顾宪成、高攀龙、刘宗周等人以风节相期,“学宗朱子,由践履而证操存,其要归于持敬”^⑧。有此家学渊源,刘氏自幼研习理学,之后主要精力虽在考据之学,却始终如一地信奉朱子义理,重视德行的践履。

概而言之,刘台拱与姚鼐在治学上同出于朱子理学,却不免受到时代学

①王念孙:《刘氏遗书序》,《宝应刘氏集》,第36页。

②朱彬:《刘端临先生行状》,《宝应刘氏集》,第38页。

③姚鼐:《惜抱轩文集》卷五《刘念台先生淮南赋跋尾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3册,第40页。

④欧阳代发:《“录遗”考辨》,《文献》1996年第1期,第256-268页。

⑤姚氏二函中除“录遗”外,还有不少反映刘氏训导工作的内容。如姚氏在函中问及镇江得士情况。又提及院试之期,各省学政官按临考试,“必以公事烦劳”。

⑥刘文兴编:《刘端临先生年谱》,第233页。

⑦姚鼐:《惜抱轩文集》卷五《刘念台先生淮南赋跋尾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53册,第40页。

⑧刘宗周:《刘宗周全书》第4册《祭年兄刘静之文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303页。

风的影响,从事经学研究。刘台拱以考据名家;姚鼐虽以文章理论、批判汉学为世所知,但他的《九经说》等经学著作重视文献、以说经为依归,足以反映出他未蹈空谈义理陋习的实学偏尚。与此同时,刘台拱与姚鼐同样反对门户之争,未曾因从事经学而落入蔑弃宋明儒学的窠臼。由此可知,刘、姚二人治学兴趣和解经方法虽异,精神意气却合辙相通,这是他们在相处之时深感投契的主要原因。由此也可以窥见,乾嘉时期从属不同学术阵营的学人之间,实则也可达成共识。乾嘉学术非考据垄断时代或汉宋之争一言可以蔽之,从刘、姚二人身上折射出的多元且复杂的乾嘉学术面貌,值得重视。

五、卢文弨函

小价回,贻手书见示,并于管见所及,为正其是非,此正文弨所祷祀而求者也。非爱我之深,不能如是,衔谢无已。书中云:“连李氏《集释》前半部一总见还。”今只领到《注疏》前半部。岂小价仓促,误入杭州行李中耶?抑尊处偶忘并付耶?乞检覆尊校《广雅》,忘即见借。

又

前《仪礼拾补》中多有误处,得先生指出,当即改正,深感之至。其“乡(乡)大夫”当作“卿大夫”一条最精。(笔者案:简体字“乡”古作“鄉”,因与“卿”字形近,传抄中易生讹误。为方便读者理解,下文引文皆以“乡(乡)”形式行文)弟向疑《礼记·射义》之“卿大夫”当作“乡(乡)大夫”,以乡(乡)可行乡(乡)饮酒之礼。若卿大夫寻常习射,如孔子射于矍相,未必皆行乡(乡)饮酒之礼。吾兄以为何如?第二卷抄出,务恳细加审正是感。

按:卢文弨,字召弓,浙江馀姚人。乾隆十七年(1752)进士,先后在京师、广东、湖南等地做官。乾隆三十三年(1768)起,主讲于江浙钟山、龙城等书院。卢氏精于校勘,著书极丰,有《群书拾补》《抱经堂集》《仪礼注疏详校》《钟山札记》《龙城札记》等著作传世。他仰慕刘氏礼学,称赞刘氏“考订礼经,致为精细”^①。完成《仪礼注疏详校》后,亦言“此书成,急须送端临一部”^②。可见卢文弨对刘氏礼学的重视。函中所说“于管见所及,为正其是非”,是指卢氏此前曾请其审阅自己校补的《仪礼》(从第二函“前《仪礼拾补》中多有误处”云云亦可知),刘氏回信中遂附上己见。

两函盖作于乾隆五十(1785,本年刘氏铨选丹徒训导)至六十年(1795,卢氏卒年)之间。卢文弨当时正主讲于江南,刘台拱则在镇江丹徒训导任

①卢文弨:《钟山札记》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5-6页。

②段玉裁:《经韵楼集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399页。

上。第一函中提及的“李氏《集释》”,是指南宋学者李如圭《仪礼集释》。刘台拱曾向卢氏借阅此书,后与所借《仪礼注疏》一并奉还。卢氏却未收到《集释》,故于函中寻问其书去向。

第二函涉及《礼记·射义》校勘事。卢氏对刘台拱的考据功力深感佩服,其《群经拾补·仪礼士冠礼注疏》《仪礼注疏详校》“乃易服遂以挚见于乡(乡)大夫乡(乡)先生”条及《钟山札记》“冠义乡(乡)大夫当作卿大夫”条,三处均引用刘氏说法,支持其说。

查传世本《仪礼·士冠礼》曰:“遂以挚见于乡(乡)大夫、乡(乡)先生。”^①刘台拱《经传小记》校云:“乡(乡)大夫,陆德明《释文》无音。至《礼记·冠义》则云:‘乡(乡)大夫,乡(乡)先生,并音香。’自此以后,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各本皆作‘乡(乡)’,即石经亦然。由今考之,此经及《冠义》皆当作‘卿大夫’,作‘乡(乡)’误也。卿大夫,谓见为卿大夫者。乡(乡)先生,谓己为卿大夫而致仕者。见君之次,遍见卿大夫。如《国语》‘赵文子冠,遍见六卿’是也。贾《疏》释注云:“‘乡(乡)先生:乡(乡)中老人,为卿大夫致仕者。”先生亦有士。郑不言者,经云“卿大夫”,不言“士”,故“先生”亦略不言。’据此,知贾所见《仪礼》本作‘卿大夫’也。孔《疏》云:‘见于卿大夫,谓在朝之卿大夫也。’是孔所见《礼记》本亦作‘卿大夫’。孔以在朝对致仕者,文义甚明。而今本《正义》亦并改作‘乡(乡)’。”^②

《仪礼·士冠礼》《礼记·冠义》重见“遂以挚见于乡(乡)大夫、乡(乡)先生”文字,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注《礼记·冠义》时,以“乡(乡)大夫”、“乡(乡)先生”并音“香”^③;传世本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及石经亦均作“乡(乡)大夫”、“乡(乡)先生”,后世对此并无疑议。刘台拱据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疏文,发现“乡(乡)大夫”之“乡(乡)”当属讹字,应作“卿大夫”,与“乡(乡)先生”对举。卿大夫乃在朝为官者,乡(乡)先生为卿大夫致仕者。《仪礼》原文应作“遂以挚见于卿大夫、乡(乡)先生”。

卢文弨受到“卿”、“乡(乡)”二字形近易误的启发,进而怀疑《礼记·射义》“卿大夫、士之射也,必先行乡(乡)饮酒之礼”中的“卿”字,可能也是“乡(乡)”字之误。他指出《射义》“孔子射于矍相之圃”的记载中,身为卿大夫的孔子行射礼之前,并未举行乡饮酒礼。这与《射义》前文所记“卿、大夫、士

①阮元审定,卢宣旬校:《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》,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(1816)南昌府学刊本,2009年,第22页。

②刘台拱:《经传小记》卷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庆十一年(1806)刻《刘端临先生遗书》本,1995年,第234页。

③阮元审定,卢宣旬校:《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》,第998页。

之射也,必先行乡(鄉)饮酒之礼”(射礼之前举行乡饮酒礼)相抵牾。由此怀疑《礼记·射义》“卿、大夫、士之射也”本作“乡(鄉)大夫、士之射也”。卢氏于函中就这一见解再次请教刘台拱^①。

“乡(鄉)”、“卿”二字字形近似,在传抄或者刻板过程中,极易产生鲁鱼亥豕之误。刘氏精通三礼之学,通过比勘各本《仪礼》及石经、注疏,最终发现这一沿袭已久的问题,并予以纠正。卢氏又在刘说基础上触类旁通,做进一步的校勘工作。从发现问题、往来论辩、解决问题,卢、刘之间的通信可说是乾嘉学者利用书信途径,促进学术研究的典型例证。

综上所述,本文所论诸函内容多为谈说近况和学术讨论。其中,姚鼐函涉及批评门户之争,以及介绍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九经说》等书刊刻事宜;任大椿函提到校勘《列子释文》过程中,发现正文与注文混淆的问题;李惇函主要为寒暄之辞,其中谈及程瑶田、王念孙、汪中等汉学名家,他们与刘台拱共同组成了乾嘉之际扬州地区的汉学群体;翁方纲函涉及三礼学,对刘台拱礼学造诣高度认可;卢文弨函围绕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在传抄过程中“乡(鄉)”、“卿”混淆问题进行讨论,在刘台拱的启发下,卢氏对相关文字作出进一步校勘。刘台拱与同时学人的往来书信,经刘文兴整理,多辑入《刘端临先生年谱》。国家图书馆藏《清芬外集》所收乾嘉学人致刘台拱书信,未为《年谱》收录,因此亦未被研究刘氏学术及乾嘉学术者关注。刘台拱传世文字不多,对以上书信的考证和解读,相信不仅对了解刘氏其人其学有所助益,同时亦可弥补刘氏与姚、任等学人之间交往互动的史料空缺。

【作者简介】黄湛,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学术思想史、经学史。

^①卢文弨《钟山札记》“射义卿大夫士之射卿当作乡(鄉)”一条,即论《礼记·射义》这一问题,可以参看。卢文弨:《钟山札记》,第5页。